

随迁老人养老安全感的关系生态及其组态机制研究^{*}

姜卫韬

摘要:随迁老人养老安全感并非单一家庭支持或社区支持的线性结果,而是家庭—社区关系生态耦合联结的组态结果。基于关系生态与组态理论化视角,本文利用东部沿海城市86对农村户籍跨省随迁老人夫妇的调查数据,运用必要条件分析(N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考察亲子、婆媳、翁婿、老乡、本地人、社区等6类关系的组态作用。研究发现:6类关系分别呈现机会、约束、沉睡、共生、互生、共栖等功能模式;单个关系要素并非高养老安全感的必要条件;高养老安全感对应3类组态模式下的5种等效条件组合,可解释性地概括为扶幼、助业、养病、向往、养老5类理想类型;高与非高养老安全感的前因组态不是彼此的简单镜像,二者存在因果非对称性。本文揭示了多重关系耦合联结随迁老人异地养老安全感的复杂路径,为特殊老年群体异地养老研究提供了基于关系生态的组态解释。

关键词:随迁老人;养老安全感;家庭—社区关系生态;NCA-fsQCA

DOI: 10. 11714/jssu. sse. 202605020

当前,中国老龄化与人口流动交叠推进,随子女跨地域迁居的随迁老人已接近1800万。与本地老人相比,他们面临熟人网络断裂、社区身份模糊和家庭角色再定位等压力,其养老安全感既取决于经济、照护与情感支持,也取决于能否在子女家庭和迁入社区形成稳定、可预期的关系秩序(池上新,2021;张栋和徐紫涵,2023;杨菊华,2021;翟振武和冯阳,2023;Joshi et al., 2025)。因此,该问题应置于异地生活的关系重组过程加以考察。

从关系生态看,养老安全感是家庭与社区多重关系交互作用的结果。随迁老人进入城市后,既要在子女家庭中获得亲子、婆媳、翁婿等代际支持,也要在迁居社区中获得老乡、本地人和社区组织等社会支持。前者涉及照料责任、资源配置和家庭身份,后者涉及日常交往、地方认同与公共服务可及性;二者可能补位或脱节,形成不同的家庭—社区关系生态(Opper & Burt, 2021; Szabó et al., 2024)。6类关系功能有别,单一关系强弱未必决定养老安全感,不同关系组合可能导向同一结果,高与非高养老安全感也未必互为镜像。由此,本文考察单个关系是否构成高养老安全感的必要条件、多重关系如何耦合联结高养老安全感,以及非高养老安全感是否具有不同于高养老安全感的形成机制。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基于关系生态与组态理论化视角(Furnari et al., 2021),结合必要条件分析(NCA)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检验6类典型关系:前者判断单个关系是否为高养老安全感的必要条件及其瓶颈水平,后者识别多重关系的等效组态与因果非对称。本文的贡献在于:细分家庭与社区中的6类关系;以“必要性因果+充分性组态”突破净效应分析的局限;构建家庭—社区关系生态框架,将异地养老安全感解释为家庭与社区双重再嵌入过程中多重关系耦合的组态结果。

^{*} 收稿日期:2026—05—31

作者简介:姜卫韬,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商学院、宁波市未来产业发展与安全研究院(宁波 315100)。

一、相关研究评述

既有研究首先从家庭养老与代际关系解释老年生活质量。相关成果强调,家庭养老在中国老年保障体系中仍具有基础地位,子女赡养、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会影响老人晚年生活(梁丽霞和黄燕,2024;王向阳,2024;聂荣等,2024;贺雪峰,2024)。然而,这些研究多将子女家庭视为整体支持来源,较少区分儿子、女儿、媳妇、女婿等不同角色在养老责任、资源配置和日常互动中的差异。对与已婚子女共同生活的随迁老人而言,亲子、婆媳和翁婿并非同质关系,笼统使用“家庭支持”容易遮蔽其功能分化。

关于随迁老人或流动老人的研究,更多从社会融入、社会适应和心理健康角度展开。已有成果运用社会资本、社会排斥、社会参与等理论,解释随迁老人进入城市社区后的适应压力及其心理后果(杨菊华,2021;陈英姿等,2022;李雨潼,2022;杨菊华和卢瑞鹏,2023;刘升,2023;毛小洪等,2024;徐晓娜等,2024;张栋和徐紫涵,2023)。这类研究揭示了异地生活的融入困境,却较少区分社区内部关系类型,因而难以解释不同社区关系对养老安全感的差异化作用。

也有研究从安全感、主观福祉和关系资源角度讨论老年人生活质量。相关成果表明,可靠的人际关系、稳定的社会支持和可预期的公共服务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的心理安全和生活满意度(van Hoof et al., 2022; Li et al., 2023; 梁丽霞和黄燕,2024;张栋和徐紫涵,2023; Dong et al., 2024)。不过,这些研究多面向一般老年人或社区居住老人,较少关注随迁老人的异地养老场景。随迁老人面临原有乡土网络弱化、新社区关系尚未稳定以及子女家庭与迁居社区支持逻辑交织的综合处境,因此需要从关系生态整体考察多种关系如何共同构成异地养老安全感的基础。

方法上,回归或相关分析侧重单变量净效应,难以识别关系要素的必要性、等效组合及高与非高养老安全感的因果非对称;整体论下的组态理论化及NCA-fsQCA恰可处理多因素并发、等效替代与因果非对称(Furnari et al., 2021; Douglas et al., 2020)。综上,现有研究对家庭代际关系、社区关系类型及二者并发耦合机制的区分和解释仍不足。本文据此构建家庭—社区关系组态框架,分析6类关系的功能模式及组态作用。

二、理论分析和模型构建

随迁老人跨省迁居的实质,是从原乡土关系网络中脱嵌,并同时开启2个再嵌入过程:再嵌入已婚子女家庭与再嵌入迁入地社区。养老安全感正是这一“双重再嵌入”所形成关系秩序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在老人主观层面的反映。在再嵌入过程中,任何一类关系对老人的作用均可沿2个维度刻画:一是支持供给强度,即该关系输送经济、照料、情感、信息与服务等资源的能力和稳定性;二是规范约束强度,即该关系以责任交换要求或排斥性压力的形式,对老人的行动空间与身份确认施加的限制。亲子、婆媳、翁婿3类关系承载家庭再嵌入,老乡、本地人、社区3类关系承载社区再嵌入;功能模式由所属场域与二维位置共同界定:场域规定关系的结构形态——家庭场域中的关系是纵向代际关系,社区场域中的关系是横向同辈关系或制度性关系,位置规定供给与约束的强度组合。据此,即便供给—约束位置相近,不同场域中的关系仍呈现不同的功能模式。下文分述6类关系时援引的血亲价值、家庭权力轴心转移、集体记忆、地方认同差异、基层治理二元张力等理论,在本框架中用于解释各关系为何处于相应的维度位置,属于统一框架之下的中层机制,而非彼此并列的分类依据;“机会”“约束”“沉睡”等功能模式命名参考了关系研究对关系功能的既有表述,此处仅借用其措辞,不涉及网络结构意义上的结构洞测量。

(一)子女家庭代际功能关系的影响效应分析

1. 亲子关系——“机会关系”功能模式

亲子关系是随迁老人与亲生子女之间基于血缘形成的代际关系。血亲价值论强调血缘关系的终生

性、天然性和自我认同特征,使子女更容易将赡养、照料和情感回应视为家庭责任(王跃生,2016;梁丽霞和黄燕,2024;Buehler et al.,2024)。随迁老人进入子女家庭后,亲子关系既承载经济支持、健康照护和情感慰藉,也影响其在家庭生活秩序中的身份确认。与其他代际关系相比,亲子关系在“支持供给×规范约束”空间中通常处于高供给、低约束位置,供给以子代对亲代的纵向反哺为主,呈现“机会关系”(opportunity)功能模式。稳定的亲子关系能够降低子女家庭再嵌入的不确定性,为养老安全感提供基础性支撑;其必要性仍需组态检验。

2. 婆媳关系——“约束关系”功能模式

婆媳关系既不同于血缘关系,也不同于夫妻关系,而是由婚姻关系联结起来的姻亲关系,其稳定性和亲密性天然弱于亲子关系(杜鹏,2022;Ayers et al.,2022)。随迁老人抱有“养儿防老”期待,往往向儿子家庭投入劳动、财力和情感;但家庭轴心由亲子向夫妻转移后,媳妇在日常生活安排和家庭资源配置中拥有更高实际影响力,养老责任也更容易被转化为基于付出、回报和边界协商的理性交换,这对随迁老人“养儿防老”的初衷形成了极大的约束(翟振武和冯阳,2023),因而处于高供给、高约束位置,呈现“约束关系”(constraint)功能模式。婆媳关系对养老安全感的作用程度仍需组态检验。

3. 翁婿关系——“沉睡关系”功能模式

翁婿关系不同于血亲驱动的亲子关系,也不同于理性交换色彩较强的婆媳关系,其互动基础更多来自对女儿婚姻生活的关注和谨慎互惠(Lewis et al.,2022)。受女儿非家族子嗣传承角色、女婿非主要家庭资源掌控者身份及日常交往频率影响,翁婿关系通常冲突外显度低,但情感黏合和责任强度也相对有限(罗茜,2023)。对随迁老人而言,翁婿关系处于低供给、低约束且依赖情境激活的位置,呈现“沉睡关系”(sleeper)功能模式:它在日常生活中未必直接支撑养老安全感,却可能在就医陪伴、重大事务协助、家庭矛盾调停等场景中被激活。因而,翁婿关系更可能作为边缘或补充条件,并与其他关系组合影响养老安全感。

(二)社区社会支持关系的影响效应分析

1. 老乡关系——“共生关系”功能模式

老乡关系以社会记忆为基础。根据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随迁老人与老乡基于地缘、业缘和相同身份形成的乡村社会记忆,不断纳入异地养老困境等新要素,重构为社区再嵌入场景下的社会记忆(刘升,2023)。这种共同记忆不仅提供日常交往话题,也为随迁老人建立社会认同和互助网络提供心理基础(邹海霞和张显,2023)。因此,老乡关系在社区再嵌入过程中虽同处高供给、低约束位置,但与亲子关系依托纵向血亲反哺不同,其供给经由同辈之间的横向互惠实现,呈现“共生关系”功能模式。老乡间的联系、互助和经验分享能够缓解异地生活的不确定性,为随迁老人获得较高养老安全感提供情感支撑。

2. 本地人关系——“互生关系”功能模式

随迁老人与本地人的关系受地方认同差异的影响。由此产生的“领地意识”,导致本地人在情感、行为上不接纳随迁老人,甚至为了避免同质性降低和公共福利遭挤兑而排斥、歧视外来的随迁老人(宋晓星和辛自强,2019;李猛等,2022)。地方认同差异由此通过社会排斥与社会距离造成社会隔阂和隔离。对随迁老人而言,本地人关系在其社区再嵌入进程中,低供给、高约束的位置特征使其呈现“互生关系”功能模式。地方认同差异产生的社会排斥和社会距离不利于随迁老人的社区再嵌入,将对其异地养老安全感带来深层次的不确定性。

3. 社区关系——“共栖关系”功能模式

社区关系指随迁老人与社区居委会、服务中心及其工作人员的制度性和日常性联系。基层社区“牌子多、任务多、会议多”等纵向过度行政化,容易挤压与随迁老人相关的公共服务、归属感调节和行为规范适应等横向社会性功能。

但社区工作者通过真实表达、主动回应和情绪劳动等亲社会人格特质展现,仍可增进随迁老人的信任和理解(孙璐,2019)。因此,二元张力下的社区关系处于中等供给、低约束位置,呈现“共栖关系”功能模式;社区组织虽受行政任务牵制,仍可提供基本服务链接和情感回应,对社区再嵌入发挥有限但稳定的正向作用。

上述功能模式由场域归属和供给—约束定位演绎得出,再由样本分布作方向性校验,而非数据聚类生成。6类关系总体差异显著(Friedman $\chi^2(5)=116.81, p<0.001, W=0.272$):亲子关系均值最高、标准差最小,婆媳关系离散度更高,翁婿关系标准差最大;老乡关系均值高于且标准差小于本地人关系,本地人关系均值最低,社区关系均值居中且较稳定,均与相应理论定位一致(见表3)。

(三)模型构建

家庭—社区关系生态中不同功能模式的关系彼此耦合,形成不同关系组态。本文聚焦2类因果问题:一是单个关系要素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构成随迁老人高养老安全感的必要条件;二是多种关系如何通过组合耦合联结高养老安全感。据此,构建理论模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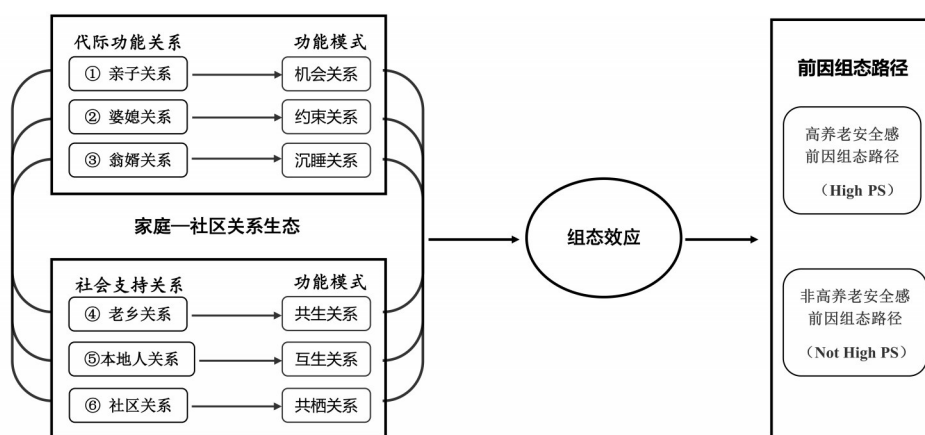


图1 家庭—社区关系生态下随迁老人养老安全感的前因组态理论模型

三、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

(一)NCA和fsQCA混合的方法

本文采用NCA与fsQCA混合方法,以兼顾必要性因果和充分性组态。NCA用于检验家庭—社区关系生态中的单个关系要素是否构成高养老安全感的必要条件,并进一步判断其瓶颈水平;fsQCA用于分析6类关系多重并发时如何形成等效路径,以及高养老安全感与非高养老安全感是否存在因果非对称。与以净效应估计为目标的回归方法不同,fsQCA关注条件组合与结果之间的集合关系,因此本文不设置传统回归意义上的控制变量,而通过案例选择、变量设定、校准标准和稳健性检验降低解释偏误。这种设计既避免将单一关系夸大为充分解释,也能识别多种关系替代、互补和并发作用的具体形态(Dul et al., 2020)。

NCA与fsQCA识别的是必要性、充分性集合关系及其非对称模式,而非净效应意义上的因果效应。横截面数据无法排除安全感对关系经营的反向影响,故下文“联结”“指向”的表述均应从集合论意义上理解,机制时序仍待追踪数据检验。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23年6月至2024年3月在宁波J社区、Q社区、深圳X社区、H社区、上海G社区等5个农村随迁老人相对集中的社区开展的问卷调查。调研对象为户籍在农村、子女在城市且均已成家的跨省随迁老人夫妇,且已在迁入地生活1年以上;对独立填答困难者,采用调查员“一对一”面访方

式。本研究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248份,剔除无效问卷76份,最终获得172份有效问卷,对应86对随迁老人夫妇样本。由于本文设置6个前因条件,理论上存在 $2^6=64$ 种前因组态,现有样本能够覆盖主要条件组合,符合中等样本QCA分析的基本要求。

本文以随迁老人家庭(夫妇对)为分析案例,共86个案例;172份问卷对应每个案例中夫妇双方各自填答的2份问卷,构成“一案例、双信息源”的数据结构。以家庭为案例单位,是因为随迁老人的养老处境依托于以夫妇为共同体的家庭生活:亲子、老乡、本地人、社区等关系是夫妇进入同一子女家庭与同一社区后共享的关系环境,相应条件与结果变量取夫妇双方评分的均值,以表征共同关系生态之下家庭整体的状态(夫妇双方评分的组内相关系数为:养老安全感0.445、亲子关系0.449、老乡关系0.359、本地人关系0.299、社区关系0.169,既包含共享成分,也存在不可忽略的个体差异;个体差异是否影响主要结论,由稳健性检验中的结果变量信息源替代模型加以检验);婆媳关系由妻方作答、翁婿关系由夫方作答,分别对应2类姻亲关系的直接体验方。这一设定也避免了将同一家庭的夫妇双方作为2个高度相似案例重复纳入所可能造成的组态覆盖度虚增问题。

同时,本文样本范围有明确限定:调研社区均位于东部沿海较发达城市,调研对象限定为农村户籍、跨省随已婚子女迁移、夫妇双方共同在迁入地生活满1年的随迁老人,未涵盖单身或丧偶、省内迁移、随未婚子女迁移以及中西部城市的随迁老人。因此,本文属于面向特定子群体的探索性组态研究,结论外推遵循分析性概括逻辑:所识别的关系生态机制可为其他情境提供理论参照,但具体组态结构不宜直接推广至随迁老人整体。

(三)变量测量

1. 结果变量

本文的结果变量是随迁老人养老安全感,参考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健康老年人标准(2022)、Lawton(1991)的老年生活质量体系模型,从健康照料医疗、经济营养福利、精神心理情感3个维度测量,具体包括身心健康、照料看护、医疗服务、经济物质、营养摄取、福利保障、精神慰藉、心理健康和情感交流等指标。

2. 前因变量

本文的前因变量为家庭—社区关系生态中的6类典型关系,即亲子关系^①、婆媳关系、翁婿关系、老乡关系、本地人关系和社区关系。各变量测量在参考既有研究和成熟量表的基础上,结合随迁老人异地养老情境及问卷收集可操作性进行设计;其中婆媳关系由妻方作答、翁婿关系由夫方作答,其余各关系条件与结果变量取夫妇双方评分的均值。具体测量维度和参考来源见表1。

(四)数据检验

信效度与同源性偏差检验结果见表2。各变量Cronbach's α 为0.727~0.859,因子载荷均大于0.5,CR为0.759~0.871,AVE为0.531~0.678,且AVE平方根均大于变量间相关系数绝对值。Harman未旋转第一主成分解释率为35.053%,低于40%的经验阈值,但该检验仅作初筛;双信息源设计及后续跨信息源组态检验进一步缓解单一评价者偏差。上述结果可支撑变量校准与组态分析。

(五)变量校准

本文以86个家庭案例为单位,采用直接校准法将结果变量和6个前因变量^②转换为模糊集隶属分

① 鉴于儿子、女儿对养老贡献侧重点不同,本文分别设计亲子关系(儿子)、亲子关系(女儿)2份问卷测量“亲子关系”,并分别进行信效度检验。

② 对“亲子关系”进行描述性统计和校准所用的数据,采用亲子关系(儿子)、亲子关系(女儿)分数之和的算术平均值。以合成变量进入主模型,并非假定儿子线与女儿线同质,而是为了在86个家庭案例下控制条件数量、避免6条件扩展为7条件所带来的有限多样性问题,并保持组态的可辨识性;儿子家庭与女儿家庭的姻亲界面差异由婆媳关系、翁婿关系2个条件承载。正文稳健性检验部分报告了分别以亲子关系(儿子)、亲子关系(女儿)替代均值变量的组态检验结果。

表1 量表设计

变量(属性)	测量维度	参考来源
养老安全感(结果)	①健康照料医疗;②经济营养福利;③精神心理情感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2)、Lawton (1991)
亲子关系(前因)	儿子:①家庭权威;②财力支持;③子嗣传承 女儿:①生活互动;②沟通交流;③婚姻影响	王跃生(2016)、梁丽霞和黄燕(2024)、 Buehler et al. (2024)、贺雪峰(2024)
婆媳关系(前因)	①操持家务;②家庭管理;③共同外出	杜鹏(2022)、翟振武和冯阳(2023)、 Ayers et al. (2022)
翁婿关系(前因)	①女儿婚姻质量;②爱好相似相互交流;③彼此矛盾分歧;④就医等大事相助	Lewis et al. (2022)、Greif & Woolley (2019)、吴帆(2022)
老乡关系(前因)	①老乡情感沟通;②老乡生活互助;③老乡馈赠与串门;④老乡本地生活经验分享	刘升(2023)、杨菊华(2021)、邹海霞和张显(2023)
本地人关系(前因)	①与本地人邻里往来与互助;②与本地人交流惯习传统;③与本地人沟通当地信息;④对迁入地的认同感	宋晓星和辛自强(2019)、李猛等(2022)、 操小晋等(2023)、李雨潼(2022)
社区关系(前因)	①社区基本公共服务享受;②社区便民利民服务享受;③社区志愿互助服务享受;④社区活动参与	张栋和徐紫涵(2023)、徐晓娜等(2024)、 孙璐(2019)、刘升(2023)

注:鉴于儿子、女儿对养老贡献侧重点不同,本文分别设计亲子关系(儿子)、亲子关系(女儿)2份问卷测量“亲子关系”,并分别进行信效度检验。

表2 信度、效度及同源性偏差分析

检验内容	关键结果	结论
信度	各变量 Cronbach's α 为 0.727 ~ 0.859,均大于 0.7	信度良好
因子载荷	各测量维度因子载荷均大于 0.5	因子载荷达标
收敛效度	CR 为 0.759 ~ 0.871; AVE 为 0.531 ~ 0.678	收敛效度较好
区分效度	各变量 AVE 平方根均大于其与其他变量相关系数的绝对值	区分效度较好
同源性偏差	Harman 未旋转第一主成分解释率为 35.053%,低于 40%	未发现单一因子主导迹象(初步筛查)

数。参照 Ragin (2008)、Fiss (2011) 及 Greckhamer (2016) 的做法,结合样本分布特征,以上四分位数(75%)、中位数和下四分位数(25%)分别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锚点。非高养老安全感通过取高养老安全感的非集获得。各变量校准锚点及描述性统计见表3。

四、分析结果

(一)必要条件分析

本文采用 NCA 与 QCA 交叉检验单个关系是否构成高或非高养老安全感的必要前提。NCA 结果显示,6 个前因变量无论采用 CR 还是 CE 方法^①,必要条件效应量(d)均低于 0.1(最高 CR=0.086,最高 CE=0.030),未达到必要条件标准;瓶颈分析中,中低目标水平多数变量为 NN,仅在较高目标水平出现局部最低要求,未形成稳定最低要求。QCA 单条件必要性检验亦显示,所有条件及其缺失状态的一致性均未超过 0.9,见表4。2 类方法结论一致:亲子、婆媳、翁婿、老乡、本地人与社区关系均不是高养老安全感或非高养老安全感的单独必要条件,需进一步从多重关系组态解释养老安全感的形成。

① CR 适用于连续变量,CE 适用于 5 个类别以下变量,本文采用两者比较结果稳健性。

表3 集合、校准、描述性统计

集合	模糊集校准			描述性分析			
	完全不隶属	交叉点	完全隶属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养老安全感	3.280	3.501	3.785	3.504	0.414	2.272	4.537
亲子关系	3.032	3.250	3.455	3.255	0.338	2.528	4.153
婆媳关系	2.722	3.056	3.375	3.021	0.531	1.667	4.500
翁婿关系	2.875	3.375	3.625	3.251	0.664	1.375	4.625
老乡关系	2.438	2.813	3.063	2.770	0.457	1.750	3.813
本地人关系	2.079	2.500	2.985	2.537	0.574	1.313	3.813
社区关系	2.750	2.969	3.297	2.996	0.397	2.063	3.938

表4 必要条件检验结果摘要

检验类型	核心结果	结论
NCA必要条件分析	6类关系CR/CE效应量均低于0.1,最高值为0.086/0.030	均不构成必要条件
NCA瓶颈水平分析	中低目标水平多为NN,高目标水平仅个别条件出现最低要求	无稳定关键瓶颈
QCA单条件必要性检验	单个条件及其缺失状态一致性均未超过0.9;高养老安全感最高为本地人关系0.788,非高最高为~社区关系0.823	与NCA结论一致

注:a. CR和CE分别为上限回归和上限包络分析;b. NN=不必要;c. “~”表示条件缺失。

(二)组态分析

本文采用fsQCA3.0识别高养老安全感和非高养老安全感的组态,设定原始一致性阈值0.8、PRI一致性阈值0.75、案例频数阈值1;在反事实分析中,不预设单个关系要素的单向作用,而是允许其存在或缺失在不同组合中发挥不同作用。本文通过中间解与简约解的嵌套关系识别核心条件;同时出现在2类解中的条件为核心条件,仅出现在中间解中的条件为边缘条件(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fsQCA分析结果见表5。

表5 在fsQCA中实现高养老安全感、非高养老安全感的组态

前因变量	高养老安全感(High PS)					非高养老安全感(Not High PS)				
	H1		H2		H3	NH1		NH2		NH3
	H1a	H1b	H2a	H2b		NH1a	NH1b	NH2a	NH2b	
亲子关系	⊗		●	●	●	⊗	⊗		•	⊗
婆媳关系	●	●	●	●		⊗			•	●
翁婿关系		•		⊗	•			•		⊗
老乡关系			•		•		•	⊗	⊗	⊗
本地人关系	●	●		⊗	●	⊗	⊗	⊗	⊗	⊗
社区关系	●	●	●	●	●	⊗	⊗	⊗	⊗	•
一致性	0.948	0.957	0.957	0.892	0.937	0.951	0.969	0.887	0.827	0.909
原始覆盖度	0.163	0.306	0.329	0.078	0.318	0.402	0.173	0.226	0.208	0.052
唯一覆盖度	0.033	0.017	0.061	0.023	0.093	0.199	0.030	0.030	0.065	0.009
总体一致性			0.928					0.899		
总体覆盖度			0.558					0.637		

注:a. 参考Ragin(2008)的表述方式,●=核心条件存在;⊗=核心条件缺失;•=边缘条件存在;⊗=边缘条件缺失;空格=条件变量无关紧要。b. 高养老安全感的标准分析中,亲子是随迁老人再嵌入子女家庭时的主要依靠,本地人关系和社区关系是社区再嵌入的主导因素,因此选取“亲子关系×本地人关系×社区关系”作为质蕴涵项(prime implicants)。c. 非高养老安全感的标准分析中,选取“~亲子关系×~本地人关系×~社区关系”作为质蕴涵项。d. PS=sense of security in later life。

1. 产生随迁老人高养老安全感的关系生态

表5显示,高养老安全感解的总体一致性为0.928、总体覆盖度为0.558,说明5种组态对结果具有较好解释力。按照核心条件的主导逻辑,本文将其归纳为3类组态模式:一是以本地人关系、社区关系和婆媳关系为核心的“社区社会支持逻辑主导+婆媳关系”模式;二是以亲子关系、婆媳关系和社区关系为核心的“子女家庭代际功能逻辑主导+社区关系”模式;三是以亲子关系、本地人关系和社区关系为核心的“家庭—社区二元逻辑”模式。3类模式下的5种组态可解释性地概括为扶幼、助业、养病、向往、养老5类随迁老人理想类型,体现出高养老安全感可以由不同关系生态等效联结。

扶幼型、助业型、养病型、向往型和养老型是依据组态核心条件并结合调研观察形成的解释性理想类型,并非由独立变量测得的实证分类。

(1)“社区社会支持逻辑主导+婆媳关系”组态模式

①组态H1a:该组态以高本地人关系、高社区关系和高婆媳关系为核心条件,并以非高亲子关系为边缘条件,呈现“多元型社区再嵌入+功能型子女家庭再嵌入”的结构。其内在逻辑是:当随迁老人能够在迁入社区获得本地人接纳和社区服务支持时,即使亲子关系不强,也可通过照料孙辈、承担家务或补贴家用等方式,与掌握家庭日常资源配置的媳妇形成较稳定的功能交换。这里的高养老安全感并非来自血亲支持的充分满足,而是来自社区互动与婆媳功能协作的互补。该关系生态可概括为“扶幼型随迁老人”,他们主要为照料孙辈而随迁,在育儿陪伴、接送照护和邻里交往中高频接触本地人和社区组织,并通过家庭贡献换取媳妇理解与支持,其安全感主要形成于社区支持与家庭照料互惠的交织。

②组态H1b:该组态同样以高本地人关系、高社区关系和高婆媳关系为核心条件,并以高翁婿关系为边缘条件,呈现“融入型社区再嵌入+规范型子女家庭再嵌入”的结构。与H1a相比,该路径不依赖亲子关系缺失,而强调随迁老人已经在经济往来、日常交往、身份认同和社区事务中形成较充分的社区融入;同时,媳妇和女婿能够较稳定地履行家庭角色与养老义务,使子女家庭内部形成更具规范性的支持秩序。处于这类家庭—社区关系生态中的典型处境可概括为“助业型随迁老人”,他们常因帮助子女创业、经营或就业而进入城市,需要频繁接触本地居民、社区组织和街道服务,也更容易熟悉迁入地规则;在家庭内部,他们以劳动投入和经营协助强化代际互惠,从而在社区融入和家庭责任分工的共同作用中获得较高安全感。

(2)“子女家庭代际功能逻辑主导+社区关系”组态模式

①组态H2a:该组态以高亲子关系、高婆媳关系和高社区关系为核心条件,并以高老乡关系为边缘条件,呈现“选择型社区再嵌入+共意型子女家庭再嵌入”的结构。这类随迁老人在经济条件、日常行动和社区参与方面与迁入地生活较为接近,也建立了较紧密的老乡关系。在子女家庭中,亲代和子代对彼此生活方式的接受度较高,对日常事务的看法较为一致,凸显共同生活中的共意性,由此带来随迁老人较高的安全感。该路径可概括为“养病型随迁老人”,他们多因就医、康复或照料便利进入城市。对子女而言,他们基于血亲价值观,投入时间、精力等稀缺资源以维护父母健康;对媳妇而言,这类经济能力较强的随迁老人可以提供某种形式的贴补、交换,因而随迁老人拥有高质量的婆媳关系;对社区和老乡而言,社区服务可及性和老乡经验支持进一步降低异地就医的不确定性。这些共同构成“养病型随迁老人”高养老安全感的重要来源。

②组态H2b:该组态同样以高亲子关系、高婆媳关系和高社区关系为核心条件,但伴随非高翁婿关系和非高本地人关系,呈现“适应型社区再嵌入+情感型子女家庭再嵌入”的结构。这类随迁老人主观上努力适应迁入地生活,在文化习俗、行为规范和社区活动参与方面基本完成整合,建立了良好的社区关系。在子女家庭中,子女、媳妇对随迁老人释放较高级别的正向情感,给予较多的生活支持,使老人获

得较高安全感。该路径可概括为“向往型随迁老人”,他们把进城视为改善生活、接近子女和体验城市服务的机会,更依赖亲子情感、家庭理解 and 社区服务,而非本地邻里深度接纳。由于其城市生活期待较强,只要家庭情感回应充分、社区服务可及,即使翁婿互动有限、本地人关系不深,也能形成相对稳定的安全感来源。该组态凸显了家庭情感和社区服务对本地人关系不足的替代补偿,也说明社区组织在低本地人接纳情境下仍有重要支撑价值。

(3)“家庭—社区二元逻辑”组态模式

组态 H3 以高亲子关系、高本地人关系和高社区关系为核心条件,并以高翁婿关系、高老乡关系为边缘条件,呈现“融合型社区再嵌入+联系型子女家庭再嵌入”的结构。该路径中,随迁老人的“双重再嵌入”过程较为顺畅:在社区层面,老人能够与本地居民和老乡保持较稳定交往,养老朋友圈较为广泛;在家庭层面,老人与其他家庭成员共同活动、彼此交往联系频率较高,在义务、责任、权利、交换、亲情等 5 种家庭代际功能中,以子代主动向上互动为主。该路径可概括为“养老型随迁老人”,多以安享晚年为随迁目标。他们的孙辈多数都已经长大了,老人承担的育儿、家务等事务相对较少,婆媳关系对高养老安全感的作用相对较弱。与前几类路径相比,该组态不是依赖某一关系补足另一关系的缺口,而是体现家庭支持、社区服务、本地交往和老乡网络的同步强化,因而更接近关系生态整体良性运转的状态。

2. 产生随迁老人非高养老安全感的关系生态

表 5 显示,非高养老安全感并非高养老安全感条件的简单反向缺失,而主要表现为 3 类关系生态。

(1)组态 NH1。第一类是家庭核心支持与社区接纳双重不足:当亲子关系、本地人关系和社区关系同时不足时,随迁老人在家庭内部缺少最基础的血亲依靠,在社区外部也难以获得接纳与公共服务支持;即使存在老乡关系,也难以弥补“双重再嵌入”失灵带来的安全感不足。

(2)组态 NH2。第二类是社区社会支持系统整体缺位:当老乡、本地人和社区关系均不足时,随迁老人缺少迁入地日常交往、情感互助、地方信息和公共服务的复合支撑。此时,即便翁婿关系、亲子关系或婆媳关系作为边缘条件出现,家庭内部支持也难以替代社区层面的持续接纳和服务可及性,养老安全感仍难达到较高水平。

(3)组态 NH3。第三类是单一关系无法替代整体关系生态:即便婆媳关系和社区关系较好,如果亲子、翁婿、本地人与老乡关系同时不足,随迁老人仍可能陷入家庭亲密关系薄弱、社区同辈支持缺失和地方接纳不足的叠加困境。这说明非高养老安全感的形成机制具有因果非对称性,不能简单理解为高养老安全感条件的反向缺失。

(三)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组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从 PRI 一致性阈值、校准锚点、亲子关系操作化和结果变量信息源 4 方面再检验。第一,在频数阈值和原始一致性阈值不变时,将 PRI 一致性阈值由 0.75 提高至 0.78,核心组态结构基本不变。第二,将校准锚点由 25%、50%、75% 调整为 23%、48%、73%,主要前因组合和解释逻辑仍稳定。第三,分别以亲子关系(儿子)、亲子关系(女儿)替代均值变量:高养老安全感解的总体一致性为 0.912、0.921,总体覆盖度为 0.640、0.624;非高养老安全感解的总体一致性为 0.911、0.935,总体覆盖度为 0.571、0.588。2 个模型均保持了 3 类高安全感模式及高与非高安全感的因果非对称性。第四,将结果变量分别替换为丈夫、妻子单方自报得分,形成条件与结果来自不同评价者的交叉设定。高养老安全感解的总体一致性为 0.887、0.909,非高养老安全感解为 0.906、0.900;社区支持主导组态和因果非对称结构仍稳定复现,覆盖度虽因个体自报噪声下降,主要组态模式和解释逻辑未发生实质变化。结果摘要见表 6。4 类检验表明,核心组态路径不随上述调整发生实质变化,研究结论稳健。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摘要

检验方式	参数调整	结果与判断
提高 PRI 一致性阈值	0.75 → 0.78	总体一致性 0.928 → 0.932, 覆盖度 0.558 → 0.534, 核心组态结构基本一致
调整校准标准	25%、50%、75% → 23%、48%、73%	总体一致性 0.928 → 0.922, 覆盖度 0.558 → 0.582, 主要前因组合和解释逻辑稳定
亲子关系操作化	均值 → 儿子线/女儿线	高解一致性 0.912/0.921, 覆盖度 0.640/0.624; 非高解一致性 0.911/0.935, 覆盖度 0.571/0.588; 3 类组态模式与因果非对称结构均保持
结果变量信息源	夫妇均值 → 夫方/妻方自报	高解一致性 0.887/0.909, 非高解一致性 0.906/0.900; 跨评价者设定下社区支持主导组态与非对称结构依然保持, 覆盖度有所下降

注: 稳健性检验仅用于确认主要组态结构和解释逻辑是否随参数调整发生实质变化, 完整组态结果以表 5 为准。

五、结论、讨论与展望

(一) 研究结论

(1) 随迁老人养老安全感的前提不是单一家庭支持或社区支持, 而是家庭—社区关系生态中多类关系的功能分化与耦合。亲子、婆媳、翁婿、老乡、本地人和社区 6 类关系分别呈现机会、约束、沉睡、共生、互生、共栖等功能模式; NCA 与 QCA 必要性检验共同表明, 任何单个关系要素都不是高养老安全感的必要条件, 也不构成稳定瓶颈。

(2) 高养老安全感主要对应 3 类关系生态组态模式: 一是“社区社会支持逻辑主导+婆媳关系”, 二是“子女家庭代际功能逻辑主导+社区关系”, 三是“家庭—社区二元逻辑”。3 类组态模式进一步形成 5 种等效组态, 可解释性地概括为扶幼型、助业型、养病型、向往型和养老型 5 类理想类型, 说明不同类型随迁老人可以依靠不同关系组合获得较高养老安全感。

(3) 非高养老安全感并不是高养老安全感条件的简单反向缺失, 而表现为家庭核心支持与社区接纳双重不足、社区社会支持系统整体缺位、单一关系难以替代整体关系生态等 3 类机制。由此可见, 随迁老人养老安全感具有明显的因果非对称性, 治理重点不应停留在补强某一关系, 而应转向家庭—社区关系生态的整体识别、差异修复与组合支持。

(二) 进一步讨论

1. 理论启示

(1) 本文将“关系生态”确立为解释随迁老人异地养老安全感的基本单位。既有研究多从家庭养老、社会融入或社会支持单线解释老年福祉, 容易将子女家庭同质化、把迁入社区简化为外部环境。本文区分亲子、婆媳、翁婿与老乡、本地人、社区 6 类关系, 识别机会、约束、沉睡、共生、互生、共栖等功能模式, 说明随迁老人面对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支持多寡”, 而是家庭与社区再嵌入中的关系秩序重组。婆媳、翁婿、老乡等常被视为边缘的关系, 也可能在特定场景中转化为重要支持。因此, 本文将解释单元由单项资源、单一关系或单个场域, 拓展至支持、约束与替代作用相互交织的家庭—社区关系生态。

(2) 本文从必要性因果和充分性组态 2 个层面揭示养老安全感的形成机制。NCA 与 QCA 必要性检验表明, 任何单个关系要素均不构成高养老安全感的稳定瓶颈; fsQCA 则显示, 不同关系组合可以等效联结高养老安全感。该发现修正了将亲子支持、本地接纳或社区服务视为单一关键变量的净效应思路 (黄飞等, 2016; 宋晓星和辛自强, 2019): 某一关系不足并不必然导向非高安全感, 其他关系仍可能形成互补、替代或协同; 非高养老安全感也不是上述条件的简单反面, 而源于家庭核心支持、社区接纳和整体关系结构的失衡。由此, 本文将“关系影响因素”推进为“关系组合机制”, 为解释多因素并发、路径等效

和因果非对称提供经验证据。

(3)本文还以5种高养老安全感组态及扶幼、助业、养病、向往、养老5类画像,推动随迁老人群体的类型化理解。这些画像不是人口学标签,而是迁移动因、家庭角色和社区嵌入方式共同塑造的关系生态类型,分别体现社区接纳与婆媳协作、社区融入与家庭责任分工、亲子/婆媳支持与社区服务可及性、家庭情感和社区服务的替代补偿,以及家庭—社区二元嵌入同步强化。这样的类型化避免将随迁老人视为同质群体或将异地养老安全感简单归因于“家庭好”“社区好”,并提示后续研究关注不同群体的关系组合、支持来源和脆弱环节。

2. 实践意义

(1)社区层面,应把随迁老人养老安全感治理的着力点放在社区再嵌入上。围绕“社区社会支持逻辑主导+婆媳关系”路径,提升社区公共服务可及性和日常接纳度,完善邻里交往、老乡互助、活动参与等低门槛平台,使扶幼型、助业型老人能够在社区互动中获得稳定支持。

(2)家庭层面,应避免把养老责任简单压给子女或某一家家庭成员。围绕“子女家庭代际功能逻辑主导+社区关系”路径,促进亲子、婆媳、翁婿等关系中的照料分工、情感回应和资源协调,尤其关注养病型、向往型老人对医疗陪伴、情感慰藉和家庭理解的需求。

(3)个体层面,应根据不同画像实施差异化嵌入支持。对养老型老人,鼓励其拓展本地人与老乡网络,保持家庭联系和社区参与;对关系薄弱者,重点识别亲子、婆媳、本地人、社区等关系短板,通过家庭协商、社区链接和同伴支持修复关系生态。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仍有三点不足,未来可进一步深入研究。第一,本文样本限于东部沿海城市农村户籍、跨省随已婚子女迁移的随迁老人夫妇,且核心变量均来自夫妇双方的横截面自我报告;尽管双信息源整合与跨信息源稳健性检验缓解了单一评价者偏差,结论对其他随迁老人群体的适用性仍有待检验,未来可面向中西部城市、非夫妇型与省内迁移的随迁老人开展比较研究,并引入子女、社区工作者等他评数据。第二,本文虽对组态结果作了定性材料补充,但访谈深度、案例过程和情境细节仍有限,也难以揭示家庭—社区关系生态随迁居时间、家庭生命周期和社区嵌入程度而变化的过程。未来可结合深度访谈、参与观察、典型个案追踪和纵向数据分析,强化对关系生态形成机制及其动态演化的过程解释。第三,本文前因条件主要聚焦亲子、婆媳、翁婿、老乡、本地人和社区6类关系,尚未纳入婆婿、翁媳、邻里组织参与等潜在关系变量。未来可在保持模型简约的基础上扩展关系维度,并引入时序QCA,进一步考察养老安全感的动态形成机制。

[参 考 文 献]

- 操小晋,刘春卉,余思奇. 老旧社区的具身实践与地方认同——基于超越表征的整合视角. 人文地理,2023(2):69—78.
- 陈英姿,赵玉港,胡亚琪. 社会融合视角下中国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 人口研究,2022(1):97—112.
- 池上新. 文化适应对随迁老人身心健康的影响. 中国人口科学,2021(3):112—125+128.
- 杜鹏. 农民家庭转型中的生活政治——基于婆媳关系的分析.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118—126.
- 杜运周,贾良定. 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 管理世界,2017(6):155—167.
-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国健康老年人标准(WS/T 802-2022). 2022.
- 贺雪峰. 应对农村老龄化的中国方案. 贵州社会科学,2024(9):133—144.
- 黄飞,周明洁,庄春萍,王玉琴,田冬梅. 本地人与外地人地方认同的差异:基于四地样本的证据. 心理科学,2016(2):461—467.
- 梁丽霞,黄燕. 代际居住安排对中国老年人家庭养老脆弱性的影响. 人口研究,2024(5):67—81.
- 李猛,乌铁红,钟林生. 旅游“网红村”居民的怀旧、集体记忆与地方认同的特征及互动关系——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恼包村为例. 地理科学,2022(10):1799—1806.

- 李雨潼. 中国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人口学刊*, 2022(1):99—112.
- 刘升. 养老型返迁:易地搬迁老人的社会融入困境及养老选择——基于某脱贫县集中安置社区的跟踪调查.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4):119—129.
- 罗茜. 转型期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再平衡机制.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3):106—116.
- 毛小洪, 杨成凤, 阳港. 中国流动老年人口城市心理融入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人文地理*, 2024(3):44—53+141.
- 聂荣, 张杨, 张莉. 子代特质、代际关系与农村个人储蓄型养老金计划. *管理学报*, 2024(4):1—13.
- 宋晓星, 辛自强. 随迁老人和本地老人的群际接触与其幸福感的关系.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9(5):615—623.
- 孙璐. 城市社区居委会工作者的情绪劳动研究——以扬州市荷花街社区居委会为个案研究. *理论月刊*, 2019(6):155—160.
- 王向阳. 家庭政治视角下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矛盾及其解释——基于华北农村的田野考察. *社会政策研究*, 2024(4):65—77+134.
- 王跃生. 中国家庭代际功能关系及其新变动. *人口研究*, 2016(3):33—49.
- 吴帆. 家庭代际关系网络:一种新家庭形态的结构与运行机制. *社会发展研究*, 2022(2):1—16+242.
- 徐晓娜, 张小鹿, 单莹洁, 王慧元. 互联网使用、社会公平感与老年人社会融入——基于中介效应与遮掩效应的考察. *西北人口*, 2024(4):60—72.
- 杨菊华. 空间理论视角下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 *社会学研究*, 2021(3):180—203+229—230.
- 杨菊华, 卢瑞鹏. “漂老”与“老漂”:国内老年流动人口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1):84—94.
- 张栋, 徐紫涵. 随迁生活感知、城市社会适应与随迁老人心理健康. *城市问题*, 2023(12):90—99.
- 翟振武, 冯阳. 当今随迁老人家庭融入中的矛盾冲突及应对. *中州学刊*, 2023(2):91—96.
- 邹海霞, 张显. 事件、经验与文化图式:理解社会记忆的三个概念.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2):184—189.
- Ayers, J. D., Krems, J. A., Hess, N., & Aktipis, A. Mother-in-Law Daughter-in-Law Conflict: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and Report of Empirical Data from the USA. *Evolutionary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22, 8(1):56—71.
- Buehler, E. M., Crowley, J. L., Peterson, A. M., & Jackl, J. A. 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s, 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Well-Being: A Communication Interdependence Perspective on Parent-Adult Child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024, 41(5):1113—1135.
- Dong, Y., Cheng, L., & Cao, H. Impact of Informal Social Support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Older Adults.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2024, 12: 1446246.
- Douglas, E. J., Shepherd, D. A., & Prentice, C. Using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or a Finer-Grained Understanding of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20, 35(1):105970.
- Dul, J., van der Laan, E., & Kuik, R. A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est for 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2020, 23(2):385—395.
- Fiss, P. C. Building Better Causal Theories: A Fuzzy Set Approach to Typologies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54(2):393—420.
- Furnari, S., Crilly, D., Misangyi, V. F., Greckhamer, T., Fiss, P. C., & Aguilera, R. V. Capturing Causal Complexity: Heuristics for Configurational Theoriz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21, 46(4):778—799.
- Greckhamer, T. CEO Compensation in Relation to Worker Compensation across Countries: The Configurational Impact of Country-Level Institution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6, 37(4):793—815.
- Greif, G. L., & Woolley, M. Sons-in-Law and Their Fathers-in-Law: Gaining a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of an Understudied Family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Family Social Work*, 2019, 22(3):292—311.
- Joshi, M., Finney, N., & Hale, J. M. Loneliness and Social Isolation of Ethnic Minority/Immigrant Older Adults: A Scoping Review. *Ageing & Society*, 2025, 45(7):1395—1425.
- Lawton, M. P. A Multidimensional View of Quality of Life in Frail Elders. In J. E. Birren et al. (eds.), *The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of Quality of Life in the Frail Elderly*.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91:3—27.
- Lewis, E. M., Lemmons, B. P., & Woolley, M. E. The Ties That Bind: An Exploration of Son-in-Law and Father-in-Law Relationships in Black Families. *Psychology of Men & Masculinities*, 2022, 23(1):99—108.

- Li, J., Chaulagain, S., & Yost, E. Residents' Sense of Safety in Senior Living Communities: A Conceptual Pap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23, 112: 103410.
- Opper, S., & Burt, R. S. Social Network and Temporal Myopia.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21, 64(3): 741-771.
- Ragin, C. C.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s and Beyo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 Szabó, Á., Stephens, C., & Alpass, F.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Support of Older Immigrants in Aotearoa New Zealand. *Ageing & Society*, 2024, 44(10): 2289-2307.
- van Hoof, J., Dikken, J., van Staaldin, W. H., van der Pas, S., van den Hoven, R. F. M., & Hulsebosch-Janssen, L. M. T. Toward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ense of Safety and Security of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Adults: The Case of the Age-Friendly City of The Hagu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2, 19(7): 3960.

Relational Ecology and Configurational Mechanisms of the Sense of Security in Later Life Among Older Parents Who Migrate to Join Their Adult Children

Jiang Weitao

Abstract: Among older parents who migrate to join their adult children, a sense of security in later life is not the linear outcome of family or community support considered in isolation, but a configurational outcome of interlocking ties within a family-community relational ecology. Drawing on relational ecology and configurational theorizing, this study analyzes survey data from 86 older couples with ru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hukou, 户口) who migrated across provincial boundaries to join their married children in cities along China's eastern coast. 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 (NCA) tests whether any single relationship is necessary for a high sense of security in later life, whereas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identifies configurations formed by six types of ties: parent-adult child ties, mother-in-law-daughter-in-law ties, father-in-law-son-in-law ties, ties with people from the same place of origin, ties with local residents, and ties with community institutions. The six types of ties exhibit, respectively, "opportunity", "constraint", "sleep", "symbiosis", "interdependence", and "commensalism" functional patterns. No single relational condition emerged as necessary for a high sense of security in later life. Five equifinal configurations, grouped into three broader configurational patterns, are associated with a high sense of security in later life and are heuristically interpreted as five ideal types centered on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supporting adult children's work or business, seeking health care, aspiring to urban life, and settling in the destination city for later life. The configura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absence of a high sense of security in later life are not simple inverses of those associated with its presence, indicating causal asymmetry. These findings reveal complex pathways linking interlocking family and community ties to older migrants' sense of security in later life and offer a configurational explanation grounded in relational ecology for research on particular groups of older adults who spend later life away from their places of origin.

Keywords: older parents who migrate to join their adult children; sense of security in later life; family-community relational ecology; NCA-fsQCA

【责任编辑:周吉梅;责任校对:周吉梅,赵洪艳】